

對話想像：意識形態與批評史-- 一個方法論的課題

劉 建 基

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1）檢視傳統馬克斯主義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對意識形態觀念的探討，（2）透過意識形態的分析策略，釐清西洋文學批評史若干流派的發展脈絡。（3）簡述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史與意識形態之互動關係。

(一)

意識形態是個極抽象的概念，對於它的來源、本質、作用，各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麥克理蘭（David McLellan）在其著作《意識形態》一書，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意識形態的兩種不同脈絡(註一)。對傳統馬克斯主義來說，意識形態一詞多帶有負面的意涵，通常指涉一套「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是資本階級矇騙普羅階級，為供其剝削之用所創。其之所以為「假」，乃因其不符合普羅大眾「真正」利益。這種「真／假」二分的判斷標準

註一：麥克里蘭指出，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主要有兩條系統，其一主要存於英國哲學之中，由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經由涂爾幹(E. Durkheim)，到本世紀的結構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一派推崇理性，以為唯有自然科學的思想方式才能產生有用的、可靠的知識；社會科學應像自然科學看齊，其方法應與自然科學相一致。另一條系統發源於德國，由黑格爾、馬克斯，經過曼海姆(K. Manheim)，到哈伯馬斯(J. Habermas)。它被稱為歷史主義傳統，強調認識不是觀察，而是創造真實。這一傳統否認有任何(客觀的)方法決定什麼是事實。

將意識形態納入「認識論的問題」(epistemological issue)範疇(Eagleton, ID 11)，並且影響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看法：「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具有操縱和欺騙功能顯示出本質的虛偽性」(王岳川 307)。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其合著的《啓蒙的辯證法》一書中闡了專章討論「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指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與趨於一律，亦指文化傳播媒體的技術化和商業化——這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性質和功用。依這兩位西方馬克斯主義理論家之見，「文化工業」就是合理化過程的一部份，它妨礙人們去認識自身的真實需要和利益，以及現存社會的非理性和非人性。對阿多諾而言，意識形態是一種「同一性的思考」(identity thinking)，「一種暗自進行，一廂情願的理性思維」(a covertly paranoid style of rationality)，將事物的「獨特性」(uniqueness)及「多元性」(plurality)溶於一爐造成「同一性」的假象(Eagleton ID 126)。很明顯的是，阿多諾對意識形態的思考判斷已由「真／假」擴及「同／異」。將「差異」(difference)、「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非同一性」(non-identity)等觀念引入其「否定辯證」(negative dialectic)的批判分析模式中，阿多諾揭示了意識形態「同質化、單一化」(homogeneity)的虛假性。基本上他承襲了傳統馬克斯主義的部份信念，將意識形態視為統治者單音獨鳴的「論述場域」(discursive field)反映某種社會經濟結構(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並且鞏固有利於該階級的世界觀(world view)。透過二元對立的判斷——以「真」破「假」，以「異」解「同」——意識形態於是被視為具「貶抑、消極、控制和遮蔽真實的功能」(沈清松 33)。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二元對立的判斷模式來解釋意識形態的概念的確有侷限性，無法充分闡明意識形態在形塑過程所蘊含的「顛覆」(subversion)與「包容」(containment)這兩種因素。「顛覆」與「包容」並不是一種簡單直接的對立，而是其有某種弔詭(paradoxical)性質的複雜過程：統治階級為了使自身得到鞏固，往往能吸納來自體系內的種種顛覆性因素，並使之得到化解。義大利的西方馬克斯主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將意識形態視為「抗爭領域」(field of struggle)，在這個領域中，統治階級必須不斷的與其他被統治團體所提出來的意見角逐及協商，已爭取「共識」(consensus)，維繫其領導權。這是一種不斷的「解構和重構」(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的過程(Mouffe 191~195)。意識形態

既然經過不斷的重組整合，同時包含各種抗爭團體的意義構連，顯然它不完全屬於某一特定階級，亦不再僅含有某一特定階級之利益。從「解構-重構」的角度來思考意識形態的意涵，「異／同」二分的判斷在「周轉」(circulation)、「協商」(negotiation) 與「交流」(exchange)（註二）的重組整合的過程中便不再具有絕對的標準，因為意識形態並不能壟斷一切，使另類的 (alternative) 或反對的 (oppositional) 意識形態消弭於無形。同時，「真／假」的討論亦隨「異／同」的複雜糾葛而難有客觀的判斷標準，不再具有積極的意義。

法國的西方馬克斯主義理論家阿爾杜塞 (Louis Althusser) 曾為意識形態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意識形態是再現個人與其生活情況間的想像關係」 (Ideology represents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lthusser 162)。這個定義除了說明意識形態是存在於「再現」表徵系統之中，亦強調它所「再現」的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人與真實世界的「想像關係」。從這個角度看來，意識形態雖然「建構一種幻象，但也確實涉及到真實」 (Althusser)。阿爾杜塞的「想像關係」之「再現」隱含著一種「真實」和「虛假」微妙的交流過程，使意識形態的觀念跨越「真/假」兩界的鴻溝。

在此筆者要說明的是，對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它的形成過程，並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筆者的分析主要是透過意識形態觀念的理解，勾勒出馬克斯主義文化研究在方法論上的脈絡。簡言之，從傳統馬克斯主義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對意識形態的分析策略是由二元對立（「真／假」，「異／同」）到二則互動，由被動的「反映論」至非機械式的「再現論」，由「建構」的統合過程至「解構—重構」的交流過程。如果我們以這種分析脈絡來對比西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脈絡，或許可以對一些文學流派有更進一步的體認。

(二)

傳統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思考是由「真／假」二分的判斷，強調意識形態的負面性和虛幻性。打從西方的文學批評傳統一開始，柏拉圖亦是由「真／假」的二元論框架推論文學

註二：借用新歷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 的術語。請參閱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的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這篇論文。

之中只有歪曲的假理或假知。「柏拉圖不斷堅持文學的一更廣泛的說，藝術的一模擬性質，強調文藝模仿外在世界的程度（雖然對柏拉圖而言，模仿外在世界當然不是件好事）」（Krieger 2）。對他而言，模仿即是非真之謂，而模仿的藝術與真實之距離尤為遼遠。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對文學大肆攻擊，將文學的模擬作用視為違反道德、正義。柯瑞格爾（Murray Krieger）指出：

在攻擊文學時，他也創造了一種符號學（semiotic），其雙重性（dualistic character）後來形塑了批評家的作品達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之久。柏拉圖之後的人，不管是攻擊文學的他的信徒，或為文學辯護的他的對手，都從得到了一個信念：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和更大的社會文本（social text）之間存在著一對一的可化約性（one-to-one reducibility）。（krieger 2）

這便是文學批評的模擬說（mimetic theory）——文學是一種模仿，猶如一面鏡子四處照映可以反射出萬物。這種「模擬說」是一種被動而機械的「反應論」，將「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的關係等同於「符號」（sign）與「指涉物」（referent）、「文本」（text）與「語境」（context）的關係。從「真／假」的框架來思考，「模擬說」提供了「寫實主義」（Realism）一種判斷，凸顯文學反應現實的「真」，以別於虛構幻想的「假」。十九世紀中葉「寫實主義」是針對不寫實的傳統一如「歌德式浪漫故事（Gothic romance）」、「流浪冒險故事（picaresque adventure）」，與寓言式想像（allegorical fantasy）」（Wimsatt & Brooks 456）——的一種反動。對「寫實主義」而言，「反應」與「再現」的模擬被類比為鏡像的複製，「原本」（origin）與「複本」（copy）之間不存在任何的扭曲。在「真／假」二分的判斷中，科學往往成為「真相」或「事實」的化身，因此傳統馬克斯主義將意識形態與科學相對立。同樣地，「寫實主義」高舉科學之大纛，強調客觀寫實的「科學超然性」（Wimsatt & Brook 456）。

德希達（Jacque Derrida）的解構理論（Deconstructionism）強調任何理解認知的思考活動皆無法脫離語言的媒介作用。這種理論凸顯語言的主觀武斷及對於客觀事實的扭曲。「解構」是一種解讀文本的策略，它強調不應在「文本」之外去設定任何「真理」、「真實」之類的範疇以作為語言指涉的唯一中心。「後設」思考讓我們瞭解「原本」與「複本」、「真

實」與「再現」之間蘊含了「差異性的重複」（*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註三)。將「異／同」的分際模糊，「解構」與「後設」思考等於是宣告「模擬說」所蘊含的「真／假」判斷已經無效，作為認知外在世界的媒介，語言是一面鏡子，而且它往往是一面哈哈鏡，所以鏡面上的影像也不見得是「真實」的（蔡源煌 193）。語言所烘呈的不是外在世界的真實全貌，而是包含扭曲、片面、虛構的「模像」（*simulacrum*）。換言之，「解構」及「後設」思考所揭示的信念便是：「再現」從來就不是拷貝「原本」的「複本」，而是不斷偏離於「原本」之外自行模擬衍異的「模像」。從「模擬說」的平面鏡子到後結構的「凹凸鏡」正好提供了文學批評中的一條脈絡——從「寫實主義」到「魔幻寫實」（*magic realism*）——的理論基礎。「魔幻寫實」強調「真實」與「虛幻」的交織雜揉：此流派之作品是從現實生活中取材，並在故事和描寫中加入神奇，怪誕的人物及情節人物及情節或是超自然現象，秉持著把現實與幻想溶為一體的創作理念。因此，「魔幻寫實」已跨越「真／假」、「異／同」的二元對立進入兩者互動的對話現象。大體而言西方文學批評中是以「模擬說」來詮釋文學對外在現實的「建構」。後來，語言的「複向指涉」（*multireference*）及虛構性被凸顯，「建構」現實的準確性乃遭質疑，於是「解構—重構」的過程不斷地持續進行，終於同一脈絡的文學作品衍生（衍異）出不同的流派。這當然是一種不斷重組整合的過程，其間蘊含了具有弔詭性質的「顛覆」與「包容」。這同時也是一種微妙的「交流」的過程，一套繁複的「交換」系統，一種充滿競爭性的「協商」。以「寫實主義」為例，它的發展便是一種「建構」、「解構—重構」的過程。「寫實主義」是一個文體變動不居、含意曖昧矛盾、可以多方擴充角色的文學流派。它不斷吸收修飾與而形成新的歧義，如「批判（critical）寫實主義」、「理想（ideal）寫實主義」、「反諷（ironic）寫實主義」、「心理（psychological）寫實主義」、「社會主義（socialist）寫實主義」等數十種，其中有許多流派如前面所提的「魔幻寫實主義」已經和「寫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大相逕庭，反而歸入「現代主義」一支。

如果歷史是對世界不斷詮釋的過程，那麼文學批評史是對「文學如何建構」這個問題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詮釋的框架已由二元對立到二則互動，由單一的平面「反應論」到繁複

註三：當代後結構主義思想觸及了「重複／差異」的弔詭：任何模仿再現作為一種「重複」並不是重複「同一性」；重複的可能性在於「差異」，只有差異才值得重複。

的、凹凸不平的「再現論」。

柯瑞格爾（Krieger）在〈西方理論中的反意識形態（counter-ideology）傾向〉一文中指出西洋批評史兩個主要傾向。第一個傾向——模擬傾向——把文學當成加強反映「意識形態的論述」（ideological discourse）；第二個傾向把文學當成顛覆「意識形態的論述」。根據前項論點，文學成為封閉的世界，為「壓制」（repression）服務；根據後項論調，意識形態是封閉、壓抑的力量，文學則是解放的力量。依他的見解，文學中的反意識形態傳統具有某種連續性——從早期柏拉圖批評文學的顛覆作用到後現代思想家歌頌抗拒體制的「崇高理念」（the sublime）（註四）。我所要強調的是，柯瑞格爾的分析架構基本上還是二元論的模式。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出，不管是從傳統馬克斯主義還是到後來的西方馬克斯主義對意識形態的思考，或是西方批評史對文學的思考，都存著一種特定的架構——從二元對立到二則互動。柯瑞格爾只注意意識形態的主導性與抗拒性兩種層面，忽略了含混雜揉的現象。他雖然沒有對意識形態下任何定義，但很明顯的他的觀點還是停留在庸俗馬克斯主義的論點：將意識形態視為統治階級的宰割方式。談到第一個傾向對「文學文本」的處理，他指出這是一種「把文學文本視為其控制社會環境的多種權力加諸於『現實』的立即反應」（the way of treating literary text : as immediate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y" imposed by the powers that control their society environment）（21）。同時，他對批評史上的兩種傾向的「文學文本」之分亦是涇渭分明。在第二個傾向，文學作品被視為「一組封閉的內化的鏡子（an enclosed set of internalizing mirror）」，彼此之間把意義和意象彈來彈去」（Krieger 8）；透過內映的複雜面向和矛盾方向，文學作品成為玻璃塗黑的窗戶，關閉了外在世界，抗拒主導的意識形態。柯瑞格爾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元對立思考架構，完全忽略了文學史中介於這兩種傾向間的各流派之作品。以「後設小說」（meta-fiction）為例，它既不完全屬於第一種傾向，亦不完全屬於第二種傾向。它是透過「諧擬」（parody）的手法，將想像的「創作」（creation）與「批判觀點」（critique）溶為一爐，使不同的意識形態產生交響共鳴。

註四：根據柯瑞格爾的看法，「崇高理念」在十八世紀的藝術思想中獲得重要地位，來挑戰「模擬說」的宰制。從郎傑納斯(Dionysius Cassius Longinus)到柏克(Edmund Burke)，然後從柏克到康德和浪漫主義者，再從他們過渡到現代主義者甚至到後現代思想家如李歐塔(Jean-Francios Lyotard)，「崇高理念」以另一類方式使語言擺脫限制、掙脫理性秩序。

對話想像：意識形態與批評史--一個方法論的課題

在《馬克斯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當代西方馬克斯主義理論家伊果頓（Terry Eagleton）對文學意識形態提出看法。他批評兩種對立觀念。他一方面反對文學作品「僅僅是支配性的意識形態之反映」（M&L 17）這種庸俗的馬克斯主義觀點。另一方面他同樣反對費歇爾（Ernst Fisher）提出的「真實藝術常常超越它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界線」（M&L 17）的說法。伊果頓為了超越這種對意識形態過於簡化的概念，試圖用阿爾杜塞的作品觀來說明藝術與意識形態的特殊關係：藝術包含於意識形態之中，但又使自己儘量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使得我們「感覺」（feel）與「察覺」(perceive)到產生它的意識形態（M&L 18）。伊果頓以文學經驗為例對阿爾杜塞將意識形態視為「想像關係」的再現，做了補充：

阿爾杜塞說，藝術不能被簡化成意識形態；可以說，它與意識形態有一種特殊的關係。意識形態表示（signify）人們藉以體驗現實世界的那種想像方式（筆者按：此觀念出自於阿爾杜塞；伊果頓以“signify”代替通用的“represent”），這當然也是文學給我們的那種經驗讓人感到在特殊條件下的生活是什麼樣子而不是對這些條件進行概念上的分析。（M&L 18）

伊果頓是用文學經驗來詮釋阿爾杜塞的「想像關係」；他所要提出的論點似乎是：文學家筆下所要烘呈的不是外在世界的一幅圖畫，而是個人和外在現實的「想像關係」。這種「想像關係」的「再現」，實際上牽扯了意識形態的複雜糾葛，其中羼雜著矛盾衝突的世界觀。職是，「文學文本」不可能是主導意識形態的簡單反應；它與事實的聯繫並不是直接的。它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是「對話式的」(dialogic)，其間夾雜「顛覆」與「包容」互動的現象。透過彼此間的「周轉」、「協商」與「交流」的過程，文學與意識形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同時它們與現實世界維持一種「想像關係」，這種關係是無法以「真/假」、「同／異」二分的標準來界定或評斷的。

(三)

二十世紀的英國文學面對文學史家專業化的析論與評估，進入了所謂「不確定的年代」（age of uncertainty）。專業化領域分割細膩，導向方法論基本架構的崩潰與重尋。文學史

家透過意識形態及典律來重新創造文學史。他們試圖回答不同的問題或給予相同的問題不同的答案。文學史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是「對話式的」，其間夾雜「顛覆」與「包容」互動的現象。文學史的書寫兼顧映射及顛覆「意識形態的論述」。以一九九七年的加特爾(Ronald Carter)及麥克雷(John McRae)所編寫的「英語文學史」(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為例。在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小說時，這兩位文學史家引用了俄國批評家巴克汀(Mikhail Bakhtin)的對話論(dialogism)來凸顯小說家——Beryl Bainbridge, James Kelman, A. L. Kennedy, Kingsley Amis, David Lodge, Angela Carter & Muriel Spark—作品的特色：小說中延用和再現「多種言語」(heteroglossia)達到眾聲喧嘩的效果。小說家拖爾金(J.R.R. Tolkien)被肯定的原因即是作品當中蘊含了對話的可能性及眾聲的交響共鳴：「拖爾金創造了一個融合神話、寓言及想像的虛構世界，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Carter 492)。換言之，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史家試圖尋求新的方法論架構，跨越真／假、異／同的分野，從作家的社會／意識形態立場與對語言「本質」之探求去定位文學作品。當代文學發展趨勢以為語言「本質」即隱隱含許多破綻、罅隙和不足，實無可能捕捉「真實」。加氏和麥氏兩位文學史家以此特色來說明二十世紀英國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及品特(Harold Pinter)之作品，認為他們採用新的戲劇語言(Carter 453)——日常語言與戲劇語言交織雜揉——呈現新的視野。在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詩人作品時，二元對立的詮釋架構被二則互動取代，其中的「交界地帶」(in-between)的含混雜揉尤被凸顯。加氏和麥氏指出，「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可以完全歸入浪漫或反浪漫的框架」(Carter 471)。因此，這種「實用與簡化(useful & simplified)」(Carter 471)的歸類被摒棄。據此，文學作品的定位本是跨越真/假、異/同之分野。這即是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史家從意識形態之理論分析與西方文學批評史之脈絡所尋得的一個方法論之啓示

引用書目

(一) 中文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大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沈清松，《阿爾杜塞的政治哲學與馬克斯主義的評估》，《哲學雜誌》第二期，一九九二年，10-42頁。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

(二) 英文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Texas UP, 1981.

Carter, Roland & John McRae.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Greenblatt, Stephen.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s. New York: Continuum, 1967.

Krieger, Murray. "The Counter-ideological Tendency in Western Theory." *EurAmerica.* 21.3 (September, 1991) 1-28.

McLellan, David. *Ide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P, 1986.

Mouffe, Chantal.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Gramsci and Critical Theory.* Ed.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Francis MacDonald Conford. New York: Oxford UP, 1967.

Wimsatt, Jr., William K.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9.